

携手打造世界美好未来

——如何在合作共赢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编者的话 新时代需要新思维，新形势需要新智慧。当今世界，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早已被时代摒弃。当2017的新年钟声敲响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呼吁：“我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大智慧大格局，也是站在人类进步高度，把握世界发展格局变化趋势，高屋建瓴地提出来的一份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中国方略。展望未来，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稳中求进、迎难而上，携手各国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引领国际秩序新变革，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

聚焦热点难点·十个如何

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不同的国家、民族所组成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集合体。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需要与世界发展总体趋势保持高度一致，需要与国际社会进行密切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与时俱进提出并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进行国际交往、处理国际事务、建构国际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握了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揭示了时代更替的内在规律。二战结束至今，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殖民体系彻底崩溃，冷战对峙不复存在，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

会

新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对立、矛盾与冲突过渡到和平、合作与和谐的新阶段。

绝大多数国家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拥护联合国宪章弘扬的主权平等原则。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同世界各国全面深入地开展互利合作发展自己，与传统大国一道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已有国际规则、合作机制与适应发展需要产生的新规则和新合作框架之间不再相互排斥和抵触，而是兼容共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新兴大国之间以及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根本性变化。殖民体系彻底崩溃，冷战对峙不复存在，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

发展机会，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利共赢，给世界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符合今日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现实。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地球村”不再是死我活、我赢你输的角斗场，而成为所有国家休戚与共的“诺亚方舟”；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相互依赖和利益交融明显加深，一国的富强不再以对别国的剥夺为前提条件，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状态正在发生改变。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性质和面貌发生巨大改变。以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为主要内容的相互关系开始转变为各个

国家主要以制度规则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和利益，合作共赢成为不同国家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

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发生变化。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加入国际大家庭之中，认同国际秩序、尊重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命运共同体理论洞见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因素不在于以对立和对抗为出发点的权力制衡，而在于以和平与发展为出发点的合作共赢，指出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将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复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引导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共同参与、共同发展，为我国在发展兴盛过程中牢牢把握时代赋予的新机遇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指导。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系列重点项目建设已经取得重要进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正在同步推进。我们倡导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开始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我想特别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

(以上均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9月3日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本版编辑 赵登华 孙昌岳

新征程：走合作共赢之路

世界各国一道，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坚持不称霸、不结盟，不干涉别国内政，才能为自身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

主张共同发展，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必须通过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给自己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赢得更多的机会。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方

面取得巨大成就，给发达国家提供新的贸易与投资机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成功典范，给全球经济增添动力与活力，给世界和平发展增加了正能量，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了新方向。

主张合作发展，做国际秩序的完善者。中国提出“迈向命运共同体”，意在同世界具有不同传统和观念的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尊重和照顾彼此的重大利益和关切，淡化和减少分歧，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作为国际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和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中国致力于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

善”。随着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履行国际承诺，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深化各层面发展伙伴关系，并为完善世界秩序提出倡议、发挥作用、作出贡献。

主张共享发展，做互利共赢的示范者。在中国的利益同世界各国的利益高度契合，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联系日趋紧密的情况下，合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共享发展为基础。因此，中国的发展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科学概括了我国在走向世界强国过程中正确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成功经验，为中国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指明了正确道路。

产生的重要经济合作机制和金融机构，包括WTO、IMF、世界银行。中国积极参与和推进亚太地区的合作组织与机制，包括APEC、东盟与中日韩(10+3)对话机制，以及由中国与东盟共同主导的RECP等。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也都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事务的载体。“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在肯定和充分利用这些合作框架与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增进整合性，增加广泛性与代表性。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问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进一步细化实化、落地落实提供了重要保障，为营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可以依托的制度性安排。

(执笔：李文)

新机制：旨在实现共同发展

立的目的在于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问题。

坚持开放性。“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的、包容的，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亚投行”同样秉持开放性原则，欢迎有感兴趣的国家或经济体申请加入。

扩大包容性。“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具有包容性和兼容性，在推进和发展过程中非但不会削弱、挑战和替代既有合作机制和既有多边金融机构，而且能够与这些机制和机构互补共进、协调发展。例如，“亚投行”的宗旨为，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机构的宗旨一脉相承。

增进整合性。中国尊重二战后国际社会

美国腐败的制度根源

金里伦

为此，有学者们直截了当地指出：“哈里·杜鲁门，这个臭名昭著的彭德格拉特腐败集团的代理人，正是他将腐败的幽灵带进了国会。”不仅如此，就连美国一些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也是一些利用腐败的政治影响榨取公共资源的腐败分子所资助的。由此可见，腐败幽灵之于美国，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绝非善良人们心目中的圣洁之所。

如今，对于美国来说，比经济腐败更为棘手的，是其政治腐败已经与政治制度融为一体。据统计，过去5年全美200家最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公司花费58亿美元影响美国政策制定，并因此获得4.4万亿美元的经济回报。这种制度性“寻租”已经成为路人尽知的公开秘密，许多美国人不仅对改变这种状况感到无能为力，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制度下少数人左右政治，改变游戏规则，驱动社会财富再分配从底层向顶层转移，使1%的富人占有美国40%的财富，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不久前，针对美国总统大选出现的种种乱象，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美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布拉姆尔撰文称，社会不公加剧、阶层流

动停滞、政府由富豪操控、政策反映利益集团观点、大多数民众陷入无能为力境地——这就是当下美国的现实。美国的政治体制受到多数美国民众内心深刻质疑，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这就是美国政局中“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在其所著的《逃离不平等》一书中分析说，美国在经济增长趋缓而收入差距又扩大的情况下，被剥夺感和不平等感成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体化政治态度背后的推手。究其根源，人们还可以看到，一向被美国引以为傲的“美式民主”，其自身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与历史和当下出现的种种经济和政治腐败乱象，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联。

其一，美国民主选择的“金钱政治”模式，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在其基本制度设计下，选举所需的巨额资金，只有富人和利益集团才出得起，政客与利益集团在金钱面前完成利益交换。因此，一些法律和判例，如有需要就有可能为利益集团提供不受限制的政治献金大开方便之门。于是，政客与

利益集团之间的腐败交易，不仅成为一种“合法”的制度腐败，而且具有集中和普遍的双重特征。

所谓集中，一是向政治高层集中。美国的腐败多集中在联邦政府、国会等高级权力机关，特别是在利益集团代言人或说客、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及其助手组成的“铁三角”关系之中。美国司法部发布的1992—2011年间美国各级政府官员腐败状况的统计数字表明，联邦政府的腐败案发率最高，地方政府次之。二是向公共服务领域集中。从各种数据分析来看，政治竞选、政府采购、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也因其背后的巨大利益成了腐败的高发区。

所谓普遍，就是围绕腐败高发领域，在各级权力机关中，上至国会议员、下达地方普通公职人员都可能与腐败发生关系。而且，从政治贿选到教育领域的贪污，从立法腐败到医疗卫生领域的黑幕，腐败已蔓延渗透到了社会各个行业。

其二，在美式民主造就的腐败温床上，利益集团构筑了最庞大、最顽固的既得利益藩篱。在这个已经制度化的既得利益藩篱

之中，利益集团向竞选者提供巨额竞选资金等具有明显利益交换特征的腐败行为，不仅演化成为美国政治过程中的合法部分，而且还往往把一己私利掺杂进公共政策之中，打着公众福祉或国家利益的幌子，模糊其违法腐败的边界。

在美国，各种媒体常常扮演反腐监督的重要角色。但在颇受争议的美国现行选举制度中，选民们往往认为一些媒体针对腐败的非中立报道，很可能是竞选中的党派之争，从而使真实的腐败指控沦为激烈的政党竞选的副产品而被忽略。强大的既得利益固化藩篱之所以很难被学者们的理性批判和公众舆论的压力所摧毁，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披着民主外衣的国家权力究竟要掌控在谁的手中。无论是政党政治还是民意诉求，说到底，掌控其天平砝码的黑手，始终都是利益集团本身。2011年9月掀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参与者主张“还权于民”，发出“占99%的民主丧失了政治权力”的呐喊，正是对利益集团操控所谓民主的强烈反抗。

说到美国的制度腐败，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泽菲尔·提绍特的一段话，令人颇受启发。她在《美国的腐败——从富兰克林鼻烟盒到联合公民胜诉案》一书中这样写道：“对于金钱与立法权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着手改变其基本结构，那么美国将面临的既不是暴民统治也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认清滥觞于美式民主的腐败，可为天下人镜鉴，使我们能看清美国政治内部更本质的东西。